

钱学森与反导弹专家徐璋本



钱学森



徐璋本

■叶永烈

徐璋本与钱学森同龄，都生于1911年。他俩都在交通大学读书，同赴美国留学。1939年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，1940年徐璋本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。钱学森研究的是导弹，而徐璋本研究的是反导弹，人称“珠联璧合的一对”。钱学森和徐璋本私交甚厚。徐璋本在1949年回国，曾在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任职。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，徐璋本调往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。

在新中国，极其需要钱学森这样的导弹专家，也极其需要徐璋本这样的反导弹专家。

遗憾的是，徐璋本教授在1957年的“反右派斗争”中，不仅被打成“右派分子”，甚至打成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，被捕入狱，判刑15年。

据徐璋本的家人介绍，出于彼此之间的深厚同窗之谊，1957年钱学森曾在一天晚上来到徐家，告诉徐璋本，要出大事了，赶快承认错误，以免遭到更大的麻烦。

在徐璋本被捕后，徐家陷入困境，钱学

森曾经给过徐家一些资助。钱学森在1958年初给徐璋本夫人王锡琼(当时徐璋本已经被捕)写了一封颇长的信。信中说，“去年除夕(引者注：指1957年12月31日)托郑哲敏同志送上40元，想已收到。”信中说这40元“作为1月份的钱”，“在这个月底，我愿意帮助您30元作为2月份的钱；在2月底，我愿意帮助您20元作为3月份的钱。”钱学森在信中提到，希望徐璋本夫人向工会请求帮助，以解决因徐璋本被捕而造成的家庭经济困难。

应当说，当时徐璋本不仅是“右派分子”，而且是已经被捕的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，钱学森仍然能够对徐璋本家属给予帮助，是难能可贵的。当时钱学森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，深知给徐璋本夫人写信可能会遭到麻烦，特地请秘书张可文抄了一份留底。后来这果然被视为钱学森没有跟徐璋本“划清界限”的表现，成为钱学森1958年入党时必须检查的“立场问题”。

在徐璋本服刑期间，钱学森还去探视过这位老同学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钱学森给主管科技的国务院方毅副总理写了一封信，表示确信老同学徐璋本没有历史问题，只是思想有些偏激。

不久，徐璋本在度过漫漫20年囚徒生活之后，终于得到“平反”而返回清华大学。他痛惜20年光阴付诸流水，拼命工作，欲夺诺贝尔奖，夜夜工作至凌晨二、三时。

1988年元旦，徐璋本给钱学森寄去贺年片，钱学森于1988年1月4日给“璋本学兄”亲笔复信。徐璋本在贺年片上写着“我们

友谊”“随岁月而茁壮”，而钱学森在回信中也感叹“我们是六十多年的同学学友了呀，中间多少事啊！”

不过，两位60多年的老同学，却对那张贺年片上的画，产生不同的看法。

贺年片通常色彩鲜艳，充满喜庆气氛。那张贺年片上的画，却是“雾蒙蒙雪地上蒺藜遍野”。徐璋本选择了这样的贺年片寄给钱学森，是因为他的人生如同“雪地上蒺藜”，20年的牢狱之灾使他如同生活在寒冬之中。

钱学森也意识到徐璋本的贺年片别有一番含意。他不便批评老同学，而是批评起画家：“难道创作者不知道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鲁迅先生在三十年代写的‘万家墨面没蒿莱’了吗？这是我国当前文艺界思想混乱的表现……”

钱学森在复函中抄了赵朴初的元旦献词《调寄驻云飞》给徐璋本：

喜报春回，十三大先开岭上梅。

开放风云会，改革洪波沸。

飞！神龙起迅雷。澄清积痼。

万里长空，四海光明被。

十亿同心振国威。

从对待一张小小的贺年片的不同看法，折射出两位老同学的不同心境。受尽屈辱的徐璋本和意气风发的钱学森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就在这一年，徐璋本因过度劳累而含恨离世，终年77岁。

获知徐璋本去世，美媒曾经发表评论说，如果中国不把徐璋本打成“右派分子”，中国反导弹技术的进步还要快得多。

两位民国语言学大家的“菊花姻缘”

一盆大黄菊花

赵元任在与杨步伟确定了恋爱关系后，整日里除了给美国哲学家罗素当中文翻译，就是想着往杨步伟当医生的医院跑。有一阵，因为工作原因，两人十天半月没见面，只用电话互相问候。某天晚上，赵元任得了空，匆匆忙忙跑来，恰碰上有急诊病人，慌乱中，赵元任把杨步伟的一盆大黄菊花一脚踢翻，连花盆也踩破了。赵元任给自己打圆场：“男人不总要鲁莽一点才像吗？我赔你几十倍好了。”

于是婚后一赔就是一辈子，每年杨步伟生日与两人的结婚纪念日，杨步伟总能收到赵元任托花房送来的一大盆菊花。



老年时的赵元任、杨步伟

■王文静

赵元任和李方桂是多年好朋友，两位又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语言学大家。

二人早年留美读书，回国后均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。有意思的是两位各自娶的夫人均为名门大家闺秀；而且两位的婚礼上，均邀请的是北大校长胡适作证婚人；抗战期间均赴美任教，多次辗转于中美欧之间，最终在美国任教直到退休，并且两对夫妇都携手共度金婚。

最让胡适羡慕的是，两位著名语言学大家，背后的教授夫人，手中都有一支会写作的笔，在陪伴语言学教授先生、长年照顾家庭的俗常生活之余，用她们最真实的纪实手法，完成了自己陪伴在教授身边的幸福生活记录，一本是杨步伟的《杂记赵家》，一本是徐樱的《我和方桂五十五年》。最有趣的是：在两位语言学大家夫人的自传里，彼此互相提及；而这两对堪称民国“神仙眷侣”的夫妻，他们的爱情故事，竟然都与菊花有关。



李方桂、徐樱与子女的合影



蟹爪菊

一支蟹爪菊

第一次约会，在雨花台饭店，具体细节在徐樱书中写得清清楚楚：“那时正是深秋，我穿了一件墨绿色法国花缎旗袍，黑丝绒大衣，襟上斜插一朵淡黄蟹爪菊花…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那么紧张，直玩到深夜回家，我才发现襟上的菊花不知何时丢掉了。”

洞房之夜，李方桂给徐樱的礼物，是一枝压扁了的菊花，正是初次相逢时，徐樱襟上佩戴又掉在地上的那朵。原来，李方桂从那时起，就认定了这个人，虽然口头上极不善于表达，但情真意切，故而这段婚姻可以风平浪静地度过五十五年。李方桂过世当天，恰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，徐樱写下这样一句话：欣逢三秋后，情钟一菊缘。

惊诧那时的爱情，小异大同。医院里的一盆盛开的大黄菊花也好，襟上遗落的那素雅的一支也罢。杨步伟、徐樱各自为了自己的爱情，甘愿躲在语言学教授背后，做家庭主妇，照顾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。在当主妇之余，她们也不甘寂寞，提起笔来，写菜谱，写自传，为后世读者留下一笔不小的精神财富。

两处菊香，一样的爱情。